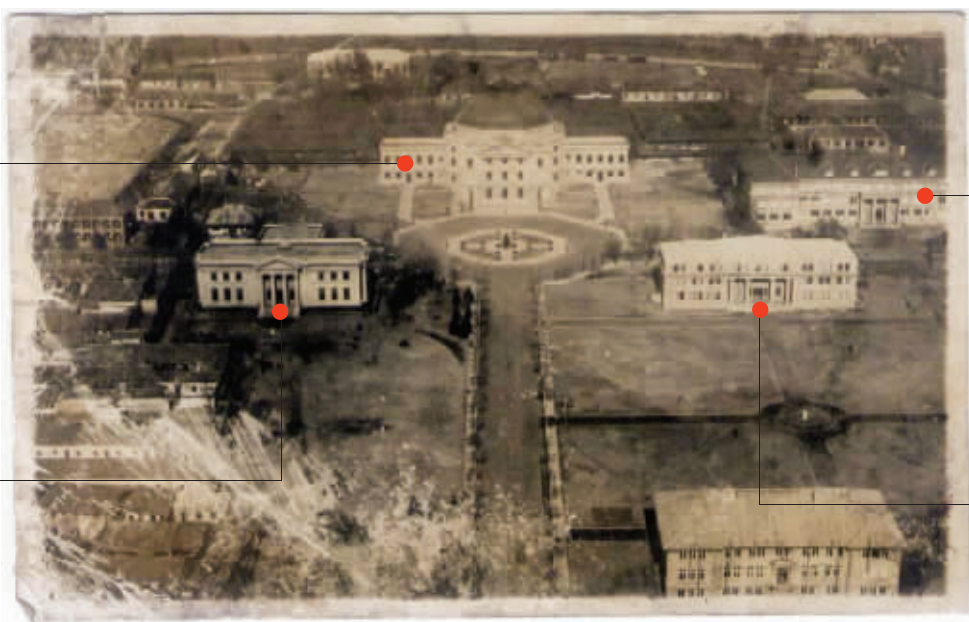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礼堂



图书馆



金小明先生收藏的国立中央大学鸟瞰原版照片



科学馆
(今健雄院)



生物馆
(今中大院)

82年前，“鸟人”眼里的中央大学

编者按

无人机技术的发展,让鸟瞰图变得不再神秘。不过,时间的年轮倒拨82圈,一张中央大学的鸟瞰图,却能让人吃惊得瞪大眼睛。庄严肃穆的大礼堂坐落在核心位置,几栋颇具规模的建筑沿中轴线摆开,风格和谐地交错罗列;楼宇之间,有舒展的空地,正在建设中的校园显得朝气蓬勃……这是南京民国文化爱好者、撰稿人金小明先生收藏的国立中央大学(南京四牌楼校园)鸟瞰原版照片。金小明先生撰文讲述了这张珍贵照片背后的故事——一张小小的照片,不仅让人一窥中央大学上世纪30年代的校园风貌,也见证了中国航拍技术的发展历程。

中原大战,航摄技术帮了蒋介石大忙

早在1855年,法国摄影师就开始借助气球在空中拍摄巴黎。飞机发明以后,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更多的“鸟人”(birdman,原指鸟类学家,后又成为空驾人员的别称)开始乘“机”跃升“一览众山小”的俯视高度,更加方便地拍摄鸟瞰式的图景(bird's-eye view)。

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之交,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军界中人起步探索航空摄影,这从当年流行刊物的时事报道中可以找到端倪和佐证。以上海出版的《良友》画报为例,第三十七期(1929年4月)(《孙中山奉安大典》)专辑,即刊发受聘于万国新闻社、号称当时“最有声望的摄影记者”王一亭在飞机上拍摄的《首都中山路鸟瞰图》《总理陵墓空中写真》及《南京狮子山炮台鸣炮一百零一响致敬》等航照。第三十九期(1929年6月)、五十一期(1930年6月)先后刊发广东航空学校(教育长、代理校长)刘植炎所撰《最近之广州鸟瞰》等航照。第四十期(1929年7月)则刊发曾任北伐东路军航空司令刘沛泉所撰《金马号飞机长途飞行空中写真》专辑。第四十四期(1929年11月)曾刊发广东空军摄影师刘锦涛所撰《第八路军事空中留影》专辑。第五十四期(1930年9月)又刊发其所撰以中原大战为背景的《战时郑州之鸟瞰》等航照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良友》第五十四期的编者附言称,“近年中国战术,进步异常迅速。回顾此次讨逆大战,冯军战壕工程之浩大及布阵之精巧,与欧战相仿。而中央军则出奇制胜,其中如空军之侦察,窥探敌阵,纵横数百里,了如指掌;进攻则掷弹打击,事半功倍”,就准确揭示了航摄术在现代大规模战争

中的作用和影响。

国民政府正式组建专门的航摄单位

除了在新闻、军事领域的运用,这一时期,官方已着手将航空摄影引入地理测绘事业。

中原大战中,航摄、侦察手段为中央军取胜发挥的助力,引起蒋介石等高层人士(包括他的德国军事顾问)的关注,一定程度上,也促使南京国民政府,于1931年8月,正式组建航摄专门单位,以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。据后来公布的《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航空测量队组织条例》规定,航测队“办理全国航空测量事务”,设立事务、航摄、测量、纠正和制图五个小组,分理其事。

航摄鸟瞰影像,因其视角高远、取景宏阔、分辨清晰,通常来讲,比较适合概括地表现山川、城垣、名胜等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象,直观地反映特定时期拍摄对象的方位特征和环境气息,成为记录自然与人文地理信息的重要载体。

民国时期,历史学家朱偰(后曾执教于中央大学)编著《金陵古迹名胜影集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),书中的图版,除大多由其本人及Metzener、Strassl二氏照相外,亦间有取自南京政府航摄部门出品的鸟瞰照片,如聚宝门、朝阳门、通济门、午朝门及内五龙桥、朝天宫、钟山及覆舟山、玄武湖、中山陵、鼓楼、下关等形胜全景,均标列该一出处。

1934年的中央大学鸟瞰照,圆顶大礼堂位于核心位置

我持有一帧该航摄队1934年左右拍摄的国立中央大学(南京大石桥校园)鸟瞰原版照片,从内容与风格上判断,与朱偰引用的航拍

照片,同属一个时期的官方出品。此照虽然局部有一些划痕,但成像比较清晰,连扩建在即的孟芳图书馆门前的碑石轮廓,也依稀可辨。

该照以著名的大礼堂(英国公和洋行设计,1930年3月始建,1931年4月竣工,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会议在此召开)为视觉中心,图书馆(法国帕斯卡尔设计,1922年1月奠基,1924年建成,1934年扩建)、生物馆(李宗侃设计,1929年始建)、科学馆(上海东南建筑公司设计,1924年始建,1927年建成)等有序地分列左右,看上去间隔有度。

这些标志性主体建筑,虽然营造有先后,且分别由不同的建筑师主理造型,但在空间布局上,共同支撑了基于摹画的轴线对称式的规整状态;在建筑风格上,则趋向于以爱奥尼亚式立柱(门廊)为特征的西方复古主义以及折中主义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的《南京民国建筑》一书,引用了同一底版的照片(154页)以及另外一帧《金陵大学鸟瞰》(159页)。

挑剔的女作家,曾批评中央大学“凌乱拉杂”

1934年的中央大学,比之上世纪二十年代,样貌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。

1928年上半年,女作家袁昌英曾有金陵之旅。访友、酬酢之余,她抽暇游览了一些新旧名胜,后作《游新都的感想》,记其履痕与心迹,发表对当时代表新文化建设成就的几所大学的观感。她在文章中,这样批评第四中山大学(以国立东南大学为骨干组建而成,时已改称江苏大学,后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)的校园格局与建筑风格:“形势虽然浩大,地盘虽然宽阔,屋宇虽然繁多,然而却讲不上建筑上综合的调和美。这里一栋红的,那里一栋白的,再那里又一栋灰的、黑

的……这里是西洋式,那里是中国式,再那里又是不中、不西式……东边一座,西北边一座,不东不西、不南不北又一座……一言以蔽之曰,凌乱拉杂而已”。作者借题发挥,指出“政治分歧、秩序荡然的情景,算是被这学府的外貌象征出来了。”

她眼中的校园“乱象”,换一个角度看,倒也是两江师范学堂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—东南大学一路发展、变迁的历史遗痕与写照。

六年之后(1934年),袁昌英又重访金陵,并作《再游新都的感想》,文章没有再评价这所在国民政府“党化教育”政治改造背景下,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进,逐步迈向其鼎盛阶段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外部景观。女作家当时如果在拍摄上述鸟瞰照片的飞机上,她对中央大学校园的观感印象,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变。

曾有人提议将中大、金大、金陵女大连成一片

中央大学的校园扩建,与首都南京的规划建设几乎同步。

1927年,国民政府定都南京,次年,将其升格为特别市。“经始之际”,乃推进“远大而完善”的国都规划建设。1929年底,国民政府发布了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——《首都计划》。计划编订中,引入了航摄资料,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处长林逸民,在为该计划向首都建设委员会的呈文中就称:“自用飞机摄制全京地图后,始有精确之地图可用。”《首都计划》掀起了以文化本位主义为主导、体现中西文化交融特点,持续十年的南京营建高潮。

《首都计划》采用综合分区的规划原则,关于“房屋楼宇之建造”,强调“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,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,尤当尽量采用”。在分区方面,《首都计划》将南京分为公园区、若干住宅区、商业区和工业区,没有采纳将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、金陵女子大学连成一片,形成所谓教育区的提议。因循历史发展的路径,中央大学的校园规划与建设自成一体,其主体建筑的风格走向,也并未因《首都计划》的上述倡导而改变。

延伸阅读

老照片后面的隐语

总起来看,关于这帧民国中央大学的鸟瞰照片,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:一是,其官方色彩的总结性的俯瞰方式,隐含着国民政府对这所著名学府的收编与改造,已取得了基本成功;二是,其显现的南雍故地的校园整体风貌,已凝结成特定时期这所国立大学的“标准”景观;三是,其反映的校区规划状态和建筑艺术水平,代表了民国首都建设以及大学建设所取得的实绩。

金小明/文

本版摄影
现代快报记者
赵杰
(除署名外)